

[就业问题研究]

三维多因视角下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江维国, 钟洁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规模较大的超龄农民工的就业转型问题引发各界关注。促进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拓展了勒温模型二维分析框架, 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维视角建构了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分析框架, 并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Probit回归等方法检验了分析框架。结果表明: 分析框架有其合理性; 年龄、健康状况等微观因素, 家庭经济、家庭关系等中观因素, 以及社会保障、社区设施等宏观因素, 均对超龄农民工重返职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建议, 应提升超龄农民工个人劳动技能, 强化家庭和社会支持, 释放内在驱动力、家庭支持力和社会拉动力, 合力实现其再就业。

[关键词] 超龄农民工; 再就业; 劳动能力; 人口老龄化; R-OMW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75(2024)05-00113-12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农民工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97亿人, 其中50岁以上者占比为29.2%, 同比提高了1.9个百分点。可见, “高龄化、超龄化”现象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 要“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发展银发经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 要保障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 为其提供继续就业机会。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和体能衰退, 超龄农民工普遍面临年龄门槛、技能限制等就业市场的“藩篱”与排斥, 就业机会不断减少^[1]。部分人甚至出现了生存、就业、权益保障“三难”困境, “古稀陷阱”昭然若现。为了保障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权益和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在未富先老、未备先老背景下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局面, 有必要加强超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一、研究进展与问题提出

农民工, 通常是指具有农业户口但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者^[2]。顾名思义, 超龄农民工是指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群体^[3]。该群体多处于“金字塔”就业结构的底层, 其共性特征主要有年龄偏高、体能相对较差、技术能力单一以及与时脱钩等^[4]。再就业可理解为, 劳动者失业

^{*} [收稿日期] 2024-04-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18BGL196)、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县乡公务员工匠精神: 理论体系和培育路径”(项目编号: 19YBA19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项目编号: 22A01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江维国(1973—), 男, 湖南益阳人, 管理学博士,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公共经济学等; 钟洁(2000—), 女, 四川泸州人,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

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后重回职场,本研究的再就业仅指后者。农民工到达超龄状态后再就业会面临劳动能力下滑、“清退令”限制极化、用工单位的“霸王条款”歧视以及产业高阶化下的“机器换人”等“拦路虎”,甚至遭遇收入持续下降等生存困境^[5]。特别是,规模庞大、接受能力更强、技能优势明显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拥挤效应”^[6],进一步压缩了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空间^[7]。然而,老有所为,余热生辉,超龄农民工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即便超过了退休年龄,大部分人在身体、智力方面完全具备继续工作的条件,技能偏向型“超龄工匠”等群体甚至在岗位匹配度、工作经验等方面还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8],能通过再就业继续为社会发展发光发热。而且,促进超龄人口再就业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不仅能实现超龄农民工的自身价值,还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整个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压力^[9]。有研究表明,超龄农民工能否实现再就业受个人、家庭等多层面因素影响^[10]。其中,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质具有内在驱动作用^[11],家庭经济基础、亲情关系等家庭禀赋则发挥着不同程度的“联动效应”^[12]。当前,有关促进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对策探讨主要聚焦于公共政策等宏观视角,如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指导^[13]^[73],延迟退休年龄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4],强化社会支持拉动再就业^[15]。

总体上看,尽管现有文献对超龄农民工及其再就业相关主题展开了颇有成效的前期探索,但该群体再就业问题在我国还是一个较新的社会议题,现有较为零散的成果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实践指导方面均存在一定局限。因此,本研究尝试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超龄农民工的本质特征及其再就业的社会属性,从多维视角进行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讨。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说

被誉为社会心理学之父的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研究个体行为时,利用二维思想建构了影响深远的“内在因素—外部环境”分析框架(以下简称“勒温模型”),即 $B=f(P; P_1, P_2, \dots, P_n; E; E_1, E_2, \dots, E_n)$ 。在该分析框架中, f 指函数关系, B 表征个体行为, P 、 E 实际上是一个分析维度,分别表征个体内在特征和个体所处特定外部环境, P_n 表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个体内在特征的集合, E_n 表示外部环境的集合^[16]。勒温模型的核心思想旨在说明个体行为选择具有多因性,是个体内在特征这个微观因素与其所处外部环境这个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7]。目前,勒温模型及其微观、宏观二维分析思路在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其合理性毋庸置疑。同理,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无疑是一种行为选择结果,并且是一种为积攒养老财富或隔代抚育孙辈等多因素复合影响下的行为选择结果。然而,从中国情境看,家庭的经济援助、亲情关怀、知识反哺等,一直都是在异乡打拼大半辈子的超龄农民工坚持务工的重要支持力量^[18],仅从强调个体内在特征的微观因素与宏观外部环境出发探讨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行为,显然忽视了其所处家庭环境这个中观因素的重要影响,不足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全面性、综合性。本研究借鉴勒温模型的核心要义,从微观、中观、宏观三维视角构建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个体、家庭及社会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从微观个人层面看,与中低龄农民工相比,超龄农民工时常因年龄增长、体能下降、技能弱化而面临就业挤压,为此,本研究探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质如何助力该群体摆脱常规劳动力市场中的“剩余人”身份,进而对再就业发挥重要驱动作用。个体特质既有先天遗传的,也有后天塑造的,年龄、性别等自出生便具备的属性是最具代表性的先天特质,教育、健康等则与后天塑造休戚相关。有研究指出,个体特质对劳动者就业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低龄的超龄农民工因具备较强学习能力,再就业概率更大^[19]。Pleau 基于 HRS 数据考察劳动者再就业的性别差异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女性再就业可能性相对更低^[20]。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培养较好的思维能力与综合素质,使劳动者对就业环境具有更强的“社会知觉”,从而在再就业市场中备受雇主青睐。健康的身体可以增加超龄农民工与一般农民工相对持

平的劳动供给, 与再就业水平具有正向线性关系^[2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虽然以往研究大多探讨了婚姻状况这个后天特质对劳动者再就业的影响, 但本研究认为超龄农民工基本都已婚, 且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婚姻状况只是家庭关系的写照, 故不将其纳入分析框架。基于此, 本研究用年龄、性别等先天特质, 以及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后天特质表征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个人内在驱动力, 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H1: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受个体因素影响。

假说 H1-a: 年龄相对越小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假说 H1-b: 男性超龄农民工比女性再就业可能性更大。

假说 H1-c: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假说 H1-d: 越健康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从中观家庭层面看, 相较于一般农民工而言, 超龄农民工始终追寻“家本位”的打工模式, 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做出任何重大抉择都须考虑家庭因素, 因而考察家庭功能是否影响其再次择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家庭功能的实现既离不开家庭经济基础, 也与特定的家庭文化、居住环境等具有内在关联。作为个体社会活动基本单元的家庭, 经济基础越好, 越可能通过提供工作找寻方面的通勤、住宿以及小本经营原始投入等方面的资金支持, 为超龄劳动者再就业或创业做出较大的边际贡献^[22]。家庭文化通常建立在和谐家庭关系基础上, 家庭关系生成的亲情关怀、代际支持等家庭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超龄农民工“临时性”就业与“漂泊式”生存的决心, 进而阻碍其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身处相对舒适的家居环境带来的积极心态与良好适应能力也是超龄农民工接纳职场“新角色”、顺应再就业环境的重要因素。综上, 本研究将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家居环境解构为促进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重要支持力量, 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H2: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受家庭因素影响。

假说 H2-a: 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假说 H2-b: 家庭关系越差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假说 H2-c: 家居环境越好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从宏观社会层面看, 超龄农民工身处社会淘汰边缘, 更渴望社会的包容来充分释放其潜在价值, 因而, 公共政策、公共设施等宏观环境对超龄群体的支持与关怀能增强其再就业的可能性。宏观环境, 通常是指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关系等要素的集合^[23]。社会保障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 而超龄农民工往往因户籍、年龄等诸多限制面临社会保障待遇低下甚至缺失等境况, 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构件, 对其而言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Vere 采用 HRS 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用人单位提供以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支持能吸引“银发打工族”继续任职^[24]。社区公共设施是社会公共设施的缩影, 在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代, 乡村公共设施落后意味着需要扩建、改建, 这将催生更多工作岗位, 这种就业“后发优势”无疑为置身“桥头市场”的返乡超龄农民工创造了工作机会。被社会学家布迪厄解释为“非体制网络”的社会关系, 是公共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 在极为注重人情冷暖的中国语境下, 对累积了大半生社会经验和公共关系的超龄劳动者而言, 高信任的沟通渠道能降低工作搜寻或转换成本, 并获取心理支持^[25], 增加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概率与信心。因此, 本研究将社会保障、社区设施与社会关系作为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外部拉动力量, 并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H3: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受社会因素影响。

假说 H3-a: 享有社会保障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更大。

假说 H3-b: 社区公共设施越落后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概率越大。

假说 H3-c: 社会关系越好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可能性越大。

根据以上讨论,借鉴勒温模型的核心思想与分析范式,本研究提出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Reemployment of Overage Migrant Workers,缩写为R-OMW)的“个体因素(Personal Factors,缩写为PE)—家庭因素(Family Factors,缩写为FA)—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缩写为SO)”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即 $R-OMW=f(PE: PE_1, PE_2, \dots, PE_n; FA: FA_1, FA_2, \dots, FA_n; SO: SO_1, SO_2, \dots, SO_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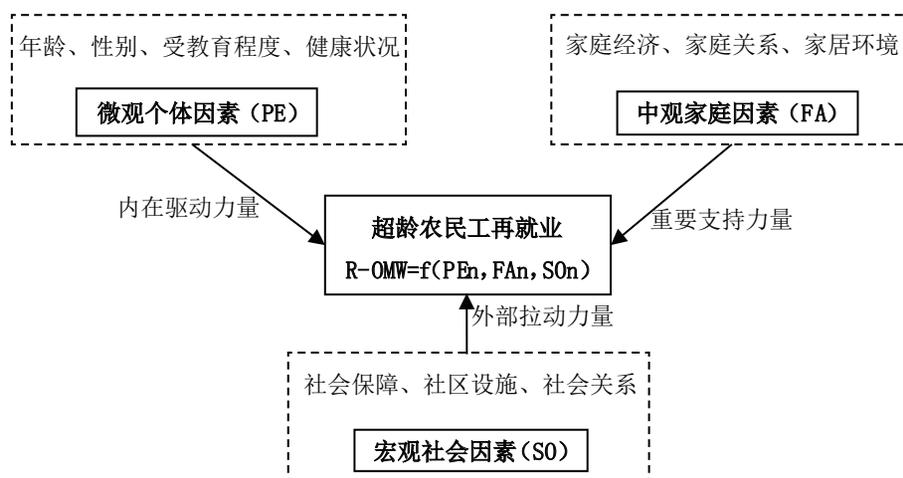


图1 R-OMW分析框架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该数据库样本覆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是我国比较权威的、具有中国家庭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库之一。作为一项综合性强、认可度高的社会跟踪调查,该项目通过持续收集个体、家庭、社会3个层面的数据,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是开展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的重要参考资料。特别是该数据库含有较为详细的农民工个人、家庭情况以及就业信息,契合本研究的需求,便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面研究个人、家庭及社会多因素与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关系。根据国家有关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本研究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且曾经或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界定为超龄农民工。为保证研究的合理性,在控制所有变量与剔除不合理数值之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00个。

(二) 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内容来源于CFPS2020年问卷中有关工作内容的问答板块。即利用原始问卷中的“您当前的工作状态如何?”表征其是否再就业,回答“在业”赋值为1,“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则赋值为0。受访样本再就业情况显示,实现了再就业的超龄农民工占比为74%,远大于未实现再就业者。这彰显了该群体重返职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事实与愿望,也进一步反映了研究超龄农民工再就业议题的社会价值。

2. 解释变量

个体层面的年龄(PE1)、性别(PE2)、受教育程度(PE3)和健康状况(PE4)变量,分别依据问卷中“您的出生年份”“您的性别”“您当前的最高学历”以及“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4

个问题进行定义。其中: 年龄为调查时受访样本实际年龄的连续变量; 性别男赋值为 1, 女赋值为 0; 受教育程度为文盲或半文盲赋值为 1, 小学赋值为 2, 初中赋值为 3, 高中及以上赋值为 4; 健康状况由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依次赋值为 1 至 5。

家庭层面的解释变量由家庭经济 (FA1)、家庭关系 (FA2) 以及家居环境 (FA3) 构成。家庭经济变量来源于问卷中“全部家庭纯收入”“家庭总支出是多少”, 为便于研究, 将实际收入与支出总额取自然对数。家庭关系用问卷中“一般情况下, 每周有几个晚上会和家人一起吃饭”表示^[26], 取值为受访样本回答的实际数值。问卷中“您家是否使用新风系统或空气净化器”可作为家居环境的衡量指标, 回答“是”赋值为 1, “否”赋值为 0。

社会层面的解释变量选取社会保障 (SO1)、社区设施 (SO2)、社会关系 (SO3) 3 个指标。用问卷中的“您是否领取养老保险”代表社会保障, 回答“是”赋值为 1, “否”赋值为 0。选取“您所住村/小区周边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整体情况如何”题项表征社区设施, 回答由很差、较差至很好依次赋值为 1 至 5; 选取“您的人缘关系有多好”代表社会关系, 赋值是 0—10 分的连续型变量。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当前工作状态如何 (1= 在业, 0= 失业 / 退出劳动力市场)	0.740	0.439
个体			
年龄	实际年龄的连续变量	59.880	7.240
性别	1= 男, 0= 女	0.355	0.479
受教育程度	当前的最高学历 (1= 文盲 / 半文盲, 2= 小学, 3= 初中, 4= 高中及以上)	2.309	1.027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状况 (由非常不健康至非常健康赋值 1—5)	2.883	1.218
家庭			
家庭经济			
家庭收入	全部家庭纯收入取自然对数	11.075	0.971
家庭支出	家庭总支出取自然对数	10.792	0.943
家庭关系	和家人吃饭次数 (晚 / 周)	5.756	2.413
家居环境	是否使用新风系统或空气净化器 (1= 是, 0= 否)	0.170	0.255
社会			
社会保障	是否领取养老保险 (1= 是, 0= 否)	0.391	0.488
社区设施	所住村 / 小区周边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设施整体情况 (由很差至很好赋值 1—5)	3.590	1.012
社会关系	人缘关系有多好 (赋值 0—10)	7.283	1.961

(三) 模型构建

因被解释变量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是取值为“0”或“1”的哑变量, 故采用 Probit 回归分析考察个体、家庭、社会三维多因素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RE_i = \beta_0 + \beta_1 PE_i + \beta_2 FA_i + \beta_3 SO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公式(1)中, RE_i 表示超龄农民工 i 的再就业状况, β_1 、 β_2 、 β_3 为模型系数, PE_i 表示年龄、性别等个体维度因素, FA_i 表示家庭经济、家庭关系等家庭维度因素, SO_i 表示社会保障、社区设施等社会维度因素, ε 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验证 R-OMW 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探究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运用 Stata 17.0 软件对个体、家庭及社会维度的各解释变量进行逐步回归(见表2)。同时, 为比较模型的拟合优度和预测精度, 使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BIC)进行模型拟合评价。由表2可知, 随着个体、家庭、社会维度各解释变量依次纳入模型, 系数 R^2 逐渐增大, 且 AIC 与 BIC 的值逐渐变小。这说明模型的拟合能力与预测力强, 研究模型有意义,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受个体、家庭及社会多维度因素共同影响, R-OMW 分析框架有其合理性。

表2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个体			
年龄	-0.061*** (-7.32)	-0.061*** (-6.86)	-0.070*** (-7.11)
性别	0.642*** (4.93)	0.600*** (4.50)	0.620*** (4.58)
受教育程度	-0.047 (-0.92)	-0.008 (-0.15)	-0.021 (-0.39)
健康状况	0.134*** (3.25)	0.141*** (3.34)	0.136*** (3.15)
家庭			
家庭经济			
家庭收入		0.068 (1.09)	0.089* (1.93)
家庭支出		-0.188*** (-2.81)	-0.175*** (-2.60)
家庭关系		-0.088*** (-3.70)	-0.089*** (-3.70)
家居环境		0.423** (2.24)	0.422** (2.22)
社会			
社会保障			0.030* (1.79)
社区设施			-0.022*** (-3.46)
社会关系			0.065** (2.45)
R ²	0.075	0.104	0.121
AIC	857.740	837.068	834.708
BIC	881.163	879.218	873.908
观测值	800	800	800

注: **、*、*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 z 值。下同。

1. 个体因素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从表 2 可知, 个体因素维度中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在 3 个模型中均对超龄农民工是否再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 但受教育程度不具显著性, 假说 H1 中除 H1-c 外均成立。从表 2 第 (3) 列来看, 年龄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表明年龄越小的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概率越大, 这与欧阳博强和张广胜^[27]的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可能是年龄相对低的超龄农民工学习能力较强, 尽管达到了退休年龄, 但通过学习也能胜任技能、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 甚至在数字化的新业态中占据一席之地, 进而实现了再就业。性别同样通过了 1% 的置信水平检验。相较于女性而言, 男性超龄农民工在身体条件等方面占据先天优势, 就业选择更广泛, 而女性往往由于代际照料责任受限于乡村, 因繁杂的家庭琐事加上固化的“主内”思想, 即便在农村也很难参与农业生产活动, 其再就业概率难免低于男性。意外的是, 受教育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能的解释是, 当前的超龄农民工大多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囿于当时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匮乏, 能接受小学教育者都寥寥无几, 样本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很低, 导致其难以对再就业产生显著影响。良好的健康状况会显著提高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概率, 原因可能是健康的超龄农民工体能、耐力等方面相较于不健康者更占优势, 能接受体力消耗大、工作时间长的再就业岗位。同时, 经过城市打拼与洗礼, 开阔了视野的超龄农民工如果具有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形象, 返乡后可能通过直播销售等方式加入当前蓬勃发展的农村电商行业, 这无疑有助于其实现再就业。

2. 家庭因素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由表 2 第 (2) 列可知, 加入家庭维度解释变量后, 仅家庭收入变量不显著, 但在模型拟合能力与预测力表现更强的第 (3) 列中, 家庭维度中的各变量均显著。可见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和家居环境都显著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假说 H2 成立。在家庭经济状况指标中, 一方面, 家庭收入在 10% 的水平下正向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家庭收入越高, 再就业概率越大, 原因可能在于, 家庭收入较高的超龄农民工能利用自身收入或家庭资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 在“再技能化”中提升了创业或再就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 家庭支出在 1% 的水平下负向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倘若家庭支出水平较低, 则意味着经济负担可能相对较轻, 能够接受较低水平工资或者临时性的工作, “就业降级”策略下反而容易实现再就业。家庭关系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产生抑制效应, 即家庭关系越好越容易将超龄农民工“挤出”再就业市场, 原因可能是家人的关爱与担心产生亲情羁绊, 导致超龄农民工在回归家庭安享晚年与告别乡土外出拼搏之间选择了前者。家居环境在 5% 的水平下积极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温馨、舒适的家居环境通常能让超龄农民工身心愉悦, 从而使其具备积极心态和更强适应能力, 能比较从容地应对社会发展和变迁, 有利于其留任原工作岗位或适应新工作。

3. 社会因素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

由表 2 第 (3) 列可知, 新加入的社会维度解释变量均具显著性, 假说 H3 均成立。社会保障在 10% 的水平下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具有提升效应, 可能的原因是参加养老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中有较大部分缴费年数不足 15 年, 再就业后用人单位愿意为其续缴, 由此激发了其继续工作的动力。社区设施在 1% 置信水平下反向拉动了超龄农民工再就业。为开发更多社区资源, 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 不少乡村地区利用“归雁”政策激励下岗或超龄农民工返乡投身家乡建设, “回流”政策引致的“反向输血”无疑会提升超龄农民工的再就业概率。社会关系在 5% 的水平下促进超龄农民工再就业, 这与朱平利和杨忠宝^[28]社会关系具有就业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社会关系越广泛, 意味着超龄农民工越可能已经遗弃了黏附在乡土社会的熟人交往规则, 打破了不少农民工在城市特有的“空间集聚性”社交边界, 从而更有可能获取与再就业有关的信息和资源, 以及关系契约下的“隐性委托担保”, 拓展了再就业选择空间。

(二) 分组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不同超龄农民工在自身素质、就业技能等方面存在明显异质性,如果能从不同侧面证实个体、家庭及社会等因素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显著效应同样存在,不仅是对前文研究结论的有力支撑,还能全面提升整体研究的合理性。相关研究表明,全职工作经历、互联网技能等人力资本差异与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可能性息息相关^{[13]73}。对此,本研究以“是否具备全职工作经历”与“是否会使用移动设备或电脑”题项作为划分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尝试从这两方面对影响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不同指标作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对比表3第(1)列、第(2)列系数发现,个体、家庭、社会维度下的具体解释变量对无全职工作经历的超龄农民工而言影响更为显著,且结果与基准回归近乎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多以散工形式在城市务工,受技能、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无法满足现代化企业的用工需要,全职工作体验较少,导致其难以进入再就业市场,而通过发挥个人驱动力、家庭支持力与社会拉动力能为其创造更多再就业机会,增强就业概率。这也说明本研究建立的分析框架较为可靠。另外,比较表3第(3)列、第(4)列可知,不使用互联网的超龄农民工更易受个体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原因在于“老一代”农民工大多游离于网络生活之外,不会或较少利用数字化工具来寻找工作,因而更易受个体特质、家庭禀赋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该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R-OMW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表3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异质性分析

变量	无全职工作经历 (1)	有全职工作经历 (2)	不使用互联网 (3)	使用互联网 (4)
个体				
年龄	-0.069*** (-5.75)	-0.030 (-1.43)	-0.077*** (-6.47)	-0.057*** (-2.78)
性别	0.617*** (3.70)	0.506* (1.79)	0.601*** (3.73)	0.569** (2.10)
受教育程度	-0.045 (-0.66)	0.090 (0.90)	-0.026 (-0.37)	0.066 (0.72)
健康状况	0.100* (1.91)	0.201** (2.31)	0.169*** (3.15)	0.112 (1.45)
家庭				
家庭经济				
家庭收入	0.082* (1.81)	0.97* (1.89)	0.109* (1.82)	-0.071 (-0.65)
家庭支出	-0.184** (-2.07)	-0.093 (-0.81)	-0.248*** (-2.85)	-0.043 (-0.38)
家庭关系	-0.088*** (-2.74)	-0.070* (-1.65)	-0.109*** (-3.23)	-0.073** (-2.00)
家居环境	0.462* (1.92)	0.365 (1.05)	0.402 (1.28)	0.439* (1.75)
社会				
社会保障	0.182* (1.94)	0.011* (1.88)	0.447*** (2.88)	0.316 (1.46)
社区设施	-0.067** (-2.07)	-0.069 (-0.69)	-0.049*** (-3.74)	-0.061 (-0.76)
社会关系	0.071** (2.16)	0.056 (1.10)	0.069** (2.11)	0.068 (1.45)
观测值	475	325	505	295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通过加入可能遗漏变量、替换变量与更换模型 3 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来说: 第一, 考虑到全职工作经历与互联网使用技能作为关键人力资本对超龄农民工能否再就业同等重要, 为此, 在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中加入这两个指标 (限于篇幅, 且主要是为检验上述模型是否稳健, 此处省略这两个指标的回归结果); 第二, 前文家庭层面借助家庭经济、家庭关系与家居环境 3 个指标进行测度, 但对于超龄农民工而言, “四代同堂” 现象较为普遍, 家庭规模大也可能是迫使其继续工作的原因, 因此用家庭规模替代家居环境的方式对上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 同样不再对家庭规模的回归结果进行展示); 第三, 前文依托 Probit 模型考察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为规避基准模型设定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不充分现象, 进一步采用 Logit 模型重新进行样本数据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对比表 2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除相关系数略有不同外, 表 4 第 (1) 列、第 (2) 列与第 (3) 列总体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几乎未发生改变, 模型估计结果均展示出较低的波动性,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即 R-OMW 分析框架具有稳健性。

表 4 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年龄	-0.061*** (-5.85)	-0.072*** (-7.11)	-0.117*** (-6.92)
性别	0.562*** (4.01)	0.615*** (4.47)	1.039*** (4.47)
受教育程度	0.011 (0.19)	-0.039 (-0.73)	-0.037 (-0.41)
健康状况	0.127*** (2.88)	0.123*** (2.85)	0.222*** (2.99)
家庭经济			
家庭收入	0.020* (1.30)	0.033* (1.17)	0.085* (0.96)
家庭支出	-0.151** (-2.20)	-0.190*** (-2.74)	-0.303** (-2.57)
家庭关系	-0.081*** (-3.23)	-0.084*** (-3.40)	-0.161*** (-3.62)
家居环境	0.435** (2.24)		0.700** (2.21)
社会保障	0.150 (1.18)	0.223* (1.78)	0.028** (2.12)
社区设施	-0.067*** (-4.52)	-0.088** (-2.54)	-0.107*** (-4.19)
社会关系	0.060** (2.20)	0.061** (2.30)	0.106** (2.35)
观测值	800	800	800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延展勒温模型的分析维度建构了R-OMW分析框架，基于2020年CFPS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法从个体、家庭及社会3个维度分析了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具有内在驱动作用。囿于劳动力市场“年龄分层”特征，年龄相对低的超龄农民工因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再就业“弹性空间”更广；男性超龄农民工相对被“绑缚”于乡土家庭的女性而言，再就业选择余地更大；身体康健带来的体能优势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具有更为明显的驱动效应。

第二，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家居环境是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重要支持力量。家庭经济能助力超龄劳动者突破再就业桎梏，家庭收入越高、开支越低是超龄农民工参与技能培训、为再就业增势赋能的经济支撑；家庭关系产生的情感牵绊在一定程度上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具有“挤出”效应，这种逆支持作用是本研究的意外发现；较为优越家居环境下形成的良好心态，是超龄农民工获得再就业红利的重要支撑。

第三，社会保障、社区设施、社会关系在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方面发挥外部拉动效应。社会保障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具有提升效应，即再就业概率随着社会保障支持力度的增加而增大；社区公共设施越落后，越容易因迫切改造的劳动力需求引发“外溢效应”，带来更多新增就业岗位，超龄农民工出于“桑梓情谊”返乡建设，以此提高再就业率；社会关系是信息交互和资源交换的基础与保障，对超龄农民工再就业有促进作用。

（二）研究建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面对日渐庞大的超龄农民工群体，如何从个体、家庭、社会等维度多措并举，助力有强烈再就业意愿的超龄农民工发挥余热，实现综合价值，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道现实课题。基于以上结论，为促进超龄农民工再就业，解决其养老困境，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升个人能力，发挥内在力量驱动超龄农民工重回职场。其一，超龄农民工应根据自身年龄参与相应的技能培训以便柔性转岗。65岁以下超龄农民工可参与智能平台使用、现代化办公等技能培训，提高智能化、自动化岗位的适应性；65岁及以上“银发一族”可加强物业服务、仓储管理等专业性较低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顺利转型为保洁、保安等体能与技术要求低的工种奠定基础。其二，女性超龄农民工可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农产品加工、包装和销售等环节中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在家门口就业突破“职业隔离”。其三，生命在于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超龄农民工可通过散步、跳操等健身活动增强体魄，提升零工经济就业能力。相对健康者还应加强数字技能学习，避免数字失能，主动寻找电商物流、直播运营等平台经济的就业创业机会。

第二，明确代际责任，凝聚家庭动能支持超龄农民工再就业。首先，成年子女在工作中应兢兢业业、发奋图强，力争升职加薪，并适当回馈原生家庭，以此提高家庭收入，为超龄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或就读老年大学储备资金。同时家庭成员还应合理规划家庭资产，通过共同制定家庭预算、明确收支，确保家庭开支处于合理范围，从而减轻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经济压力。其次，家庭成员在关心超龄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同时，也要尊重该能动主体继续发挥余热的意愿，鼓励其到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养老院等从事服务、照料等相对轻松的工作，避免闲出“退休综合征”。最后，家庭成年子代要帮助超龄农民工父母改变过于勤俭的习惯，通过翻修房屋、购买现代家具等途径尽量为其创造舒适的家居环境，使其在“老有所安”的生活环境下养成乐观心态，摆脱家庭“边

缘化”心理落差,重拾再就业信心。

第三,强化社会支持,释放外部拉动效应助推超龄农民工有所为。一是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吸纳超龄农民工再就业,并为未缴纳足够年限者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以此激励该群体继续就业。二是在社区基础公共设施改建、扩建过程中,应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将返乡超龄农民工组织起来,通过官方渠道承揽村容村貌整治、危房改建和公共设施完善等优化社区环境的小型工程项目,不断扩大返乡就业的“蓄水池”。同时,可设立社区再就业咨询中心,为有劳动意愿的返乡超龄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岗位介绍等服务,帮助其尽快重回职场。三是社区、用人单位可通过宣讲会、志愿活动等方式,鼓励、组织超龄农民工参与集体活动,以此拓宽其社交“半径”,累积社交资源,帮助其了解行业动态、职位招聘等信息,增大再就业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1] 种聪,岳希明. 农民工收入现状、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4-23.
- [2] 张原. 农民工就业能力能否促进就业质量?——基于代际和城乡比较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2): 18.
- [3] 张永奇,单德朋. 路在何方: 数字失能对超龄农民工就业关系的影响探究——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J]. 兰州学刊, 2023(9): 153.
- [4] 孙雅,周金阳,李婷. 退休再就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55-68.
- [5] 靳小怡,胡钊源,顾东东. 谁是“高龄”农民工——基于流动人口监测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评论, 2018(7): 271-280.
- [6] 郭庆.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J]. 经济地理, 2021(3): 161-169.
- [7] 夏延芳. 论高龄农民工社会救助精准治理体系构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9): 1-6.
- [8] 吴敏,段成荣,朱晓.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J]. 人口学刊, 2016(4): 93-102.
- [9] 雷晓康,王炫文,雷悦橙. 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市的个案访谈[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6): 102-109.
- [10] 冉东凡,吕学静. 退休人口再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J]. 社会保障研究, 2020(2): 36.
- [11] 康姣姣,闫周府,吴方卫. 农村劳动力回流、就业选择与农地转出——基于千村调查的经验研究[J]. 南方经济, 2021(7): 72-86.
- [12] 陆淑珍,卢璐. “养”与“工”——超龄农民工养老模式的探索性研究[J]. 南方人口, 2015(6): 50-58.
- [13] 宋林,何洋.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3).
- [14] 邓睿. 社会资本动员中的关系资源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J]. 经济学动态, 2020(1): 52-68.
- [15] 姜晓萍,康传彬. 关系—动机: 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形成机理研究[J]. 治理研究, 2023(4): 61-74+159+2.
- [16] 勒温. 拓扑心理学原理[M]. 竺培梁,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75-180.
- [17] 江维国,李立清. 被征地青年的颓废问题: 沦陷因素与规避措施[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9): 78.
- [18] 覃凤琴,陈杭. 个人素质、家庭状况与农民工就业区域的选择[J]. 统计与决策, 2019(7): 89-93.
- [19] 赵明霏,冯婧.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J]. 学术交流, 2020(9): 102-111.
- [20] PLEAU R L.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stretirement employment[J]. Research on Aging, 2010, 32(3): 267-303.
- [21] 王轶,王琦. 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J]. 当代财经, 2016(5): 3-11.
- [22] 李天成,孟繁邨. 产业升级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经纬, 2020(4): 47-55.
- [23] 杨政怡,杨进.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J]. 青年研究, 2021(2): 17-31.
- [24] VERE J P. 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J]. Labour Economics, 2011, 18(5): 676-686.
- [25] 赵清军,何军. 从谋生到融入: 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参与[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9): 99.
- [26] 徐海东. 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J]. 人口与经济, 2023(6): 142.
- [27] 欧阳博强,张广胜.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48-61.
- [28] 朱平利,杨忠宝.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44-53.

A Study on the Re-employment of Over-age Migrant Workers under the Three-Dimensional Multi-Causal Perspective

JIANG Weiguo, ZHONG 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employment transition issues faced by a large number of over-aged migrant workers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promote the re-employment of over-aged migrant workers, hence, effectively utilizing th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plays a key role in actively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ging population. This study expands the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ewin's model, and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R-OMW from individual, family, and social three-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2020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it employs methods such as Probit regression to tes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Results indicat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OMW; and micro factors like age and health status, meso-level factors like family economy and family relations, as well as macro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security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R-OMW.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labor skills of over-aged migrant workers,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and unleashing inherent driving forces, family support, and social pull be taken to collectively achieve the R-OMW.

Key words: over-aged migrant workers; re-employment; labor capability; population ag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OMW

[责任编辑: 孙 蕊]

(上接第18页)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in Chinese Trade Union Studies

HUANG Shuai¹, LIU Dun², LIU Yaoyao³

(*1.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2.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3. School of Labor Union,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Chinese trade union studies (CTUS), guided by the Marxist theory of labor movement, i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that examines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ctivity regulations of trade unions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After more than 70 years of development, CTUS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explicit knowledge boundary,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 relatively mature discipline system, thus becoming a candidate for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CTUS should be guid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articularly adhering to Xi's key statements o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rade union work, with Marxist theorie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labor movement serving as a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asi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reflecting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labor movement endeavors and trade union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urrently, there are differing view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the discipline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TU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de unions, proposes that CTUS should establish three secondary disciplines of theoretical union studies, lab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nion practice. It is hoped that thi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TUS.

Key words: working class;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Chinese trade union studi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徐文粉]